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摘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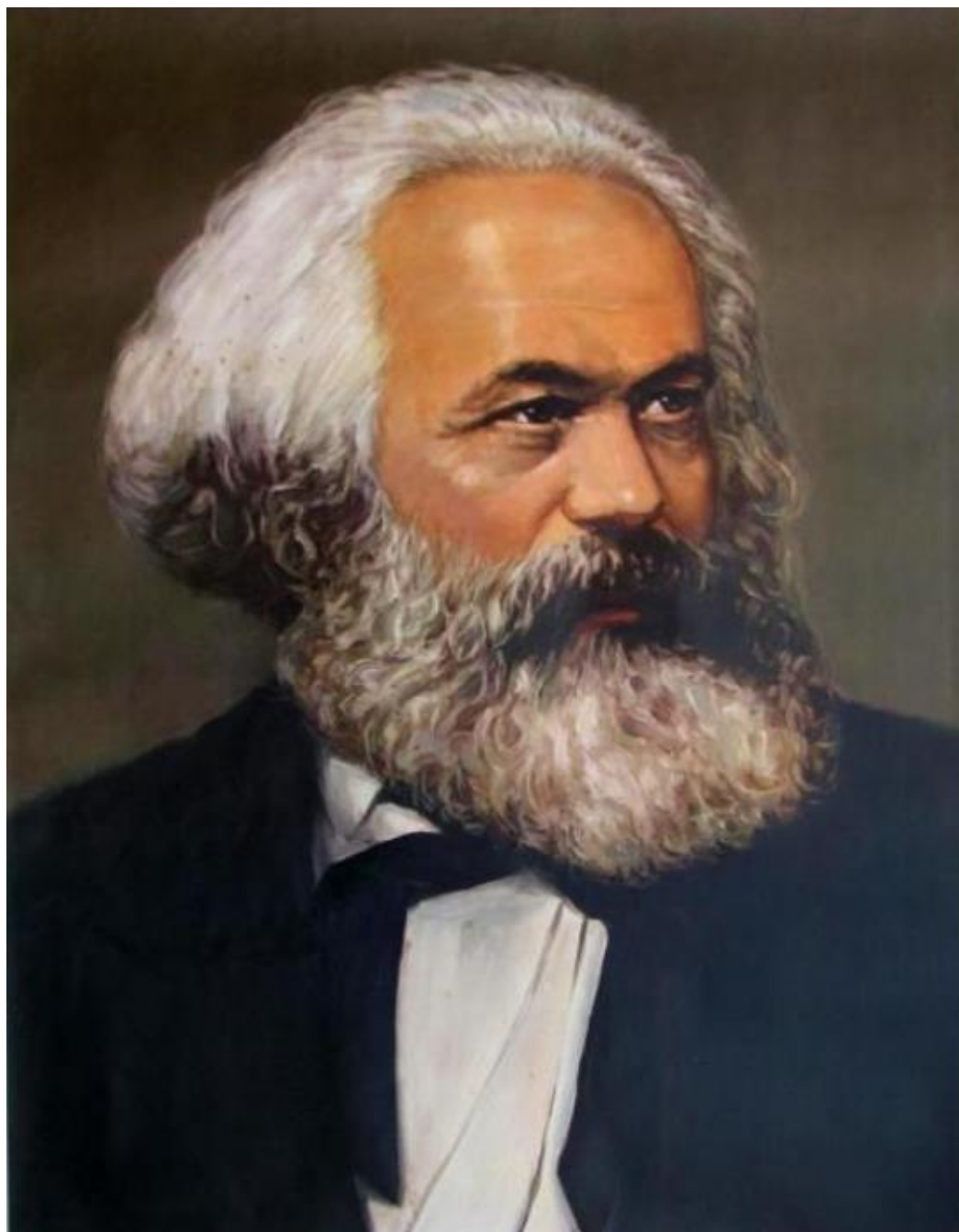


(初稿)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摘编

主 编 鲁 凡
排 版 ZhuCR Chi_ZJ
校 对 Chi_ZJ
增 补 ××× ×××

 星火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编者的话

从事生产服务劳动的工友们：

大家辛苦了！

多年前在新华书店，我见到一位棉大衣上沾着水泥浆的工友也来到店里，他从一楼书架底层娴熟地拉开一扇柜门取出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坐在地上就看起来。可见，有的工友从切身经历中产生了对马恩思想的需要。马恩学说是发现和应用社会发展规律，谋求工人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思想体系，确实不可不读。可是，对于每天从事十二小时或更多繁重劳动的人来说，属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实在有限，得花多大力气、多少年月才能读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啊？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搞一个十来万字的《摘编》，再忙再累的人只要想读也容易读完，从而对马恩思想有个大体上的了解；若想对一些问题查阅原著，沿着《摘编》提供的线索去查，也许能够便捷些。这样，就搞出了这个《摘编》。由于水平所限，应摘未摘的肯定会有，希望同志们不吝指正。

鲁 凡

2021年1月10日

编辑说明

这是一位老同志为了使广大一线工人便于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而摘编的马恩著作选读本。由于还是初稿版本，所以马恩资料库全体成员希望能在本站收到一些宝贵的建议或意见，以帮助对这本小册子进行完善。书籍定稿后，我们会印刷成册。希望能得到读者同志们的踊跃反馈！

反馈途径：mebk_org@hotmail.com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编辑小组

2021年2月28日

凡 例

一、本《摘编》摘引的文字均摘自人民出版社的版本，为节省时间，除在此说明之外，不再逐条标注，摘自第一版的，标注一版；摘自第二版的，标注二版。

二、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仅注《全集》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仅注《选集》；

三、原著中的着重号仍用**黑体字**表示；编者加的着重号用下加线表示。

四、文摘的顺序。在同一标题下同类内容的，按原著的写作时间先后排列。

五、分类标题都是编者加的不另标示；正文中编者加的文字，用方括号 [] 标出。其中须注意 “[……]” 表示删减。部分文段是对原文的概括，删减较多，不用 “[……]” 表示。

目 录

第一章 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规律

第一节 辩证唯物主义·····	2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	8
第三节 现代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私欲对真理的歪曲·····	53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

第一节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摘抄·····	63
第二节 《资本论》摘编·····	68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也成了商品·····	68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	72
三、资本主义积累·····	88
四、靠牺牲工人而实现劳动条件的节约·····	101
五、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	106
六、货币资本、产业资本、企业经理与董事·····	110
七、银行、信用与股份公司·····	115

八、银行资本、有价证券、虚拟资本、 货币资本家与经济危机	119
九、综 述	127
第三节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述摘抄	132

第三章 人类解放事业

第一节 人类解放事业的目标	147
第二节 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前提、条件	158
第三节 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主体与理论	169
第四节 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道路与方法	183
第五节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它必 将遍立于全世界”	208

第一章

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规律

第一节 辩证唯物主义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 [……] 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无非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2页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个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2页

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

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361页

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他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才适用；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联结起来，消失在关于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361页

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应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361页

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的，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391页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或者表现为电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都处在一种或另一种上述运动形式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上述运动形式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399—400页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62页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矛盾的；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62—463页

水在标准气压下，在 0°C 时从液态转变成固态，在 100°C 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结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着本质的差别。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68—469页

如果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么它在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生长、开花、结果，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

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不是一粒，而是加了10倍20倍，或30倍。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78页

那么，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

摘自《选集》二版3卷484页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259页

辩证法，它们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310 页

运动，就它被理解为存在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8 年）

摘自《选集》第二版 4 卷 346 页

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 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也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运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8 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347 页

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 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243 页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

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82—83页

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这种发展非常缓慢；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延续下去。[……]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124页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摘自《选集》第二版1卷132页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142页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

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的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72—273页

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74页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

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重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74—275页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75页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本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今天更是在全球各地到处寻找劳动力成本的洼地；因此，我们必须联合世界各地的工人兄弟们，共同保卫和争取提高工资底线。]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主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76页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76页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76—277页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77页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

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77页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

[……]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

者。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78页

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正如在正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611—612页

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关最紧密地交写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

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

摘自《选集》第二版1卷623—624页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675—676页

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

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

因此，社会是由于构成社会物质基础的劳动群众得不到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 31 卷 214—216 页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和经济结构，既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摘自《选集》二版 2 卷 32—33 页

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须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后一阶级的人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哲学思考或文学创作，只是因为他们摆脱了一切生产上的操心，摆脱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制造和运输，工人阶级必须养活这批与工人阶级本身相分离的人。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

摘自《全集》二版 32卷 343—345页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分工原则建立的，[……]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时，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

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务的温床。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53—54页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氏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了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历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因此就必然地产生把私有制同样的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共有形式，后者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它才将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机械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80—481页

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90页

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也就同样具有了这样一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90—491页

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方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91页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那时，普遍存

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互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物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公仆在情况有利时怎样逐步变为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

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希腊的部落首领，克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结合成一个统治阶级。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经让位于各个家族分得地块单独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并存的现象一样，是十分古老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 **奴隶制**被发现了。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

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522—524页

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性命了。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重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525—526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17—618页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

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物：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32页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

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产生的资

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776—777页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

——《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656页

“易洛魁人” 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

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

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95—97页

“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97页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大多数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它们已经在有城墙保护的都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

各个小民族，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02—103页

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组织如下：

一、常设的权力机关为**议事会**，这种议事会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酋长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的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

二、**人民大会** [……] 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人民大会由议事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事务；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级的权力，[……]原来，当部落中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有可能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

三、**军事首长**（巴赛勒斯）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位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么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很有可能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证明不经过人民选举就实行合法继承。这里所说的情况，就是氏族内部特殊的贵族家庭的最初萌芽，除此之外还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制的最初

萌芽。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03—104页

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已经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

被发明出来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04—107页

“雅典国家的产生” 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成了私有财产，[……]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杂居起来，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08页

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成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

[……]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关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个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08—109页

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既不理睬氏族也不理睬胞族。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住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么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么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09—110页

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奴隶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氏族制度最初并没有奴隶制，因而也就没有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公职都设置起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模的小区，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骑士，这个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12—113页

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阶级：
500、300及150袋谷物（1袋约等于41公升），为前三

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一切公职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公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 特权的形式得到更新，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14页

克里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区域，分别实行自治。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过去的氏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作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是一种军事组织，它选举50名代表参加雅典议事会。

结果组成了雅典国家，它是由10个部落所选出的500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15—116页

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

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的了。到了雅典全盛时期,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放奴隶为45000人。这样,每个成年男性公民至少有18个奴隶和2个以上的被保护民。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16—118页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罗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说,希腊氏族是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发现其原始形态的那种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么,这对于罗马氏族也完全适用。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度这一点外,都完全是易洛魁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18—121页

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是由300个氏族酋长组成的,氏族酋长总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

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这些家庭自称为贵族并且企求进入元老院和担任其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时间的进展，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这种企求就变成实际权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25页

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炸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28页

共和国的贵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种种斗争，最后贵族融化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的新阶级中，这种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逐渐吞并了因兵役而破产的农民的一切地产，并使用奴隶来耕种由此产生的广大庄园，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从而不仅给帝政而且也给帝政的后继者德意志野蛮人打开了门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29页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の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的,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切。掠夺成了目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45—146页

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

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持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48页

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损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49页

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值得费力去取得的收益，因为它的产品市场已经消灭了。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150 页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三分之二在自己人当中分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151 页

各德意志氏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组织起来。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而这种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种国家。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152 页

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赠送或赏赐给他的扈从队。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的基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153 页

在查理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

弱和相应贵人跋扈 [……] 最后, 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 法兰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 法兰克王国便毫无反抗地匍匐在诺曼人的脚下, 正和 400 年前罗马帝国匍匐在法兰克人的脚下一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153—154 页

氏族制度的伟大, 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 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 一切部门中生产的增加, 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 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 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 俘虏变成了奴隶。[……] 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 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 分裂为两个阶级: 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158—161 页

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 成为可能: 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如此多样的活动, 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 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 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 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

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63页

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64页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为。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64—165页

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是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它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实际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谁有了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65—167页

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

日益增长。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民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67—168页

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与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允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69页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

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70页

国家和旧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70—171页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

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72页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72页

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

产品的支配。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74—175页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76页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

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77页

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78页

“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历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¹

¹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79页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247页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251页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他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的环节弄模糊了。但

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253页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688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

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

摘自《全集》二版4卷695—697页

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独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定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

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

——《恩格斯致康·施密特》(1890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700—701页

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的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恩格斯：《致康·施密特》(1890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701页

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

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恩格斯：《致康·施密特》（1890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705页

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地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持，[……]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单行本（1891年）

摘自《选集》第二版3卷12—13页

第三节 现代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私欲 对真理的歪曲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

摘自《选集》二版1卷55页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

摘自《选集》二版1卷55页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

摘自《选集》二版1卷56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

摘自《选集》二版1卷57页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资本论》（1872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4页

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1—22页

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像，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像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374—376页

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美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31页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56页

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的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

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63页

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81页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

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蔽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244页

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一卷

有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如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他们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这一批人来说，在经济学上被列入丑角、家仆一类，被说成靠真正的

生产者养活的食客、寄生者，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这对于那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恰恰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褻渎。

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因此，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

摘自《全集》一版 26卷一册 167—168页

后来甚至又有一些人[……]企图把资本家对物质财富的要求归结为“工资”，即归结为一个“生产劳动者”所取得的报酬。[……]已经是作出妥协并且承认不直接包括在物质生产当事人范围的一切阶级都具有“生产性”的时候了。大家互相帮忙[……]无所事事的人也好，他们的寄生者也好，都必须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

摘自《全集》一版 26卷一册 169页

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政治经

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推崇并给以辩护，说它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说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说他是“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

摘自《全集》一版 26卷一册 169—170页

大多数反驳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著作家，都把**消费**看作对生产的必要刺激，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靠收入来生活的[……]非生产劳动者，甚至从**创造物质财富的意义来说**，也和生产工人一样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扩大物质消费的范围，从而扩大生产的范围。可见，这种看法大部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出发，一方面为有闲的富人和提供**服务**给富人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辩护，另一方面为开支庞大的“强大政府”辩护，为国债的增加为占有教会和国家的肥缺的人，各种领干薪的人等等辩护。因为所有这些非生产劳动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生产“**非物质产品**”，但消费“**物质产品**”，即生产工人的劳动产品。作为全部争论的基础的，倒是下面这些：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于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品。因此，全部余额都是工人为别人生产的。所以工

人的这部分产品全是为别人而生产。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

摘自《全集》第一版 26 卷第 1 册，291—292 页

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了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

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在经济上”证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

摘自《全集》一版 26 卷第 1 册 315 页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 1 卷 10 页

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新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

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217页

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巧的斗争，不偏不依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17页

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玄学家。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258页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

第一节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摘抄

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 [……] 只是由于它是资本的所有者。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摘自《全集》二版3卷238页

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同一性。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3卷123页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30卷147页

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

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30卷286页

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同样工具是**他人的工具**，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体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对象化劳动，表现为**他人的财产成为与活劳动对立的他人的权力**。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30卷444—445页

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从对劳动的管理等方面看，劳动对于劳动能力来说也是他人的。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30卷455页

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

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化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 31 卷 92—93 页

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 31 卷 94 页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对自然界的了解

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 31 卷 100—101 页

资本本身是处于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 31 卷 101 页

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力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 [……] 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 31 卷 149—150 页

在发达的资本运动中，存在着不同于危机的方式阻碍

资本运动的另一些因素：例如，一部分现存资本不断贬值；很大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并不充当直接生产要素的固定资本；很大一部分资本被非生产地浪费掉，等等。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 31 卷 150 页

工人作为工人而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状态下，当然是不同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

摘自《全集》二版 32 卷 49 页

其他一切劳动同生活资料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相比，就已经成为可供支配的时间。生产商品的劳动部门按其必要性的程度而互相区别——从这一考虑来说农业劳动（这里应理解为一切为了创造直接的食物所需要的劳动）是最必要的。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

摘自《全集》二版 32 卷 216 页

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星期死亡 15 人，到 1861 年为止的十年中约死亡 10,000 人。这主要是由于煤矿主卑鄙的贪得无厌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是最节省已实现的劳动，

即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的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实际上，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

摘自《全集》二版32卷405页

第二节 《资本论》摘编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也成了商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

商品首先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47—49页

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

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52页

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53页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等等。

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而不形成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54页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58页

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88页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195页

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具有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198页

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人的能力而存在。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

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求，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198—199页

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199—200页

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00页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劳动力的

价值以下，因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01页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

（一）价值的增殖过程

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15页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

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16页

在商品的生产中，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的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17—218页

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18页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的形式，由运动形式转化为对象性形式。一小时终了时，纺织运动就表现为一定量的棉纱，于是一一定量的劳动，即一个劳动小时，对象化在棉花（纱）中。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21页

在劳动力出卖时，曾假定它的日价值=3先令，在3先

令中体现了 6 个劳动小时，而这也就是生产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量所需要的劳动量。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 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 1 卷 222 页

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3 先令，因为在劳动力本身中对象化了半个工作日，就是说，因为每天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要费半个工作日，但是，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 24 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下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差额。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 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 1 卷 225—226 页

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

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而持续下去，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27页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进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29—230页

比社会的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

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有一部分则是基于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

工人阶级的体质已经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一般说来，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较简单劳动，如瓦匠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得多。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30页

（二）资本主义剥削的程度

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32页

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39页

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们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相反，转

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地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们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43页

假定价值产品=180磅,代表整个生产过程期间流动的劳动,我们从中扣除90磅可变资本,就可得到90磅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可变资本价值增值的比率,显然是由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来决定,或者用 $\frac{m}{v}$ 来表示。在上述例子中它是 $\frac{90}{90} = 100\%$,我把可变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值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称为剩余价值率。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49页

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我把工作日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使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

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51页

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 $\frac{m}{v}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

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到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程度（不是绝对量）的准确表现。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51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像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68—269页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工人在一日之内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当然比一个自然的生活日短。短多少呢？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69—270页

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求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71—272页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必需的劳动时间之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会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罗马工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但是在古代世界，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72—273页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23页。1836年6月初,迪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利附近有八个大工厂的场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雇佣12—15岁的儿童五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做“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30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这些被告先生虽然没有发誓,但是硬说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本来允许这些可怜的孩子睡四个小时,但是这些固执的孩子偏偏不肯睡!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80页注释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

“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10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1000磅放进了我的口袋。”²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81页

²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56页。

“1860年1月14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丁汉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志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³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82页

威廉·伍德，“从7岁零10个月就开始做工”。他每周天天早晨6点上工，晚上9点左右下工。“我每周天天都干到晚上9点钟。例如最近七八个星期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个7岁孩子竟劳动15小时！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83页

北斯塔福德郡医院主任医生阿利奇说：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形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不长，迟钝而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症、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有一种哮喘

³ 1860年1月17日的伦敦《每日电讯》。

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称陶工哮喘病或者陶工肺结核。还有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疬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 $\frac{2}{3}$ 以上。[……]”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84页

火柴制造业工人中有一半是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在委员怀特1863年询问过的证人当中有270人不满18岁，40人不满10岁，10人只有8岁，5人只有6岁。工作日从12到14或15小时不等，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而且多半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85—286页

“面包工人从星期四起，晚上10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中间只有很少休息。”⁴

这些“卖低价面包的老板”，连资产阶级观点也承认：“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他们进行竞争的基础”。而“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则向调查委员会揭发说，他们“卖低价面包”的竞争者盗窃别人的劳动，并在面包中掺假。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⁴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以及《第1号报告》第LXXI页。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90页

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活活累死》的标题报道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60个少女一起连续干了 $26\frac{1}{2}$ 小时，每30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 $\frac{1}{3}$ 。玛丽·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医生基斯先生作证说：

“致死的原因，是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长，以及寝室太小又不通风。”

[限于篇幅，只引这些，如欲了解更多，请见原著第八章“工作日”部分。]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94—295页

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求剩余劳动，像狼一样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06页

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06—307页

工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49页

（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

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66页

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决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67页

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他个别地所做的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场合所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70页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71页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家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的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值的直接手段。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582页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革命。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583页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I.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可变资本}} \left(\frac{m}{v} \right)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劳动力价值}}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circ}$$

前两个公式是价值的比率，第三个公式是生产这些价

值所需要的时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

$$\text{II.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工作日}}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产品价值}} = \frac{\text{剩余产品}}{\text{总产品}}。^{\circ}$$

这些公式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错误的。⁵ 如果把这些公式看作资本自行增殖程度的直接表现，就会得出一个虚假的规律：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决不能达到 100%。

$$\text{III.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劳动力价值}}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 \frac{\text{无酬劳动}}{\text{有酬劳动}}。^{\circ}$$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 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 1 卷 607 页

三、资本主义积累

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

⁵ 这句话是编校者加的。

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660—661页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666—667页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683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

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685页

在论述剩余价值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692页

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而获得的追加劳动，没有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应增加，也能够增加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即积累的实体。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696页

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721页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值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728—729页

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也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733—734页

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736—737页

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曼彻斯特保健医官利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⁶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739页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

⁶ 当时的伯明翰市长约·张伯伦1875年1月14日在伯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

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743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743页

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743—744页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应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这是工人的贫困。”

最勤劳的工人阶级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754—757页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纽卡斯尔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挤在一起。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762页

布拉德福德的贫民诊所的一位医生贝尔在他 1865 年 9 月 5 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在文森特街、格林—艾尔广场和利斯，有 223 栋房子住着 1450 人，可是只有 435 个床铺和 36 个厕所 [……] 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每个床铺平均睡 3.3 人，有些甚至睡 5—6 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一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

[限于篇幅不再多引，欲了解更多请看原著第二十三章中的《公共卫生报告》。]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764页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 1866 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的丧旗成群结队的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他们快要饿死了，他们共有 4 万人 [……]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 4 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1867 年 4 月 5 日《旗帜报》）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 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 1 卷 771—772 页

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在作证时说：

“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苏格兰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⁷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 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 1 卷 782 页

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⁷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 年伦敦版第 2 卷证词。

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822页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因此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843页

亨利八世时期，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获得一种行乞许可证。相反地，身强力壮的流浪者要遭到鞭打和监禁。亨利八世二十七年，法令加上了更严厉的条款。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

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843页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一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右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岁，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留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845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846页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

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861页

关于基督教的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861页

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西里伯斯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西里伯斯岛的秘密监狱中。一份官方报告说：

“望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强行和家人分离。”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862页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磅；1722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磅；英国议会曾宣布，用警犬搏杀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863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上流人士”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869—870页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评论家季刊》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 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 1 卷 871 页正文和注释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种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夺了。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 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 1 卷 874 页

四、靠牺牲工人而实现劳动条件的节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

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的手段。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101页

因为工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些生活条件中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101页

资本有一种趋势，要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

减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因而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101—102页

煤矿。对最必要支出的忽视。

“在煤矿工人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危险，忍受最有害的影响，为的是挣得比附近的农业短工略高的工资，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备；往往是竖井建造得很差，支架很糟，机械师不够格，坑道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1829年4月21日》第102页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103页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10年内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报告本身所指出的，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这种草菅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例如，好

些地方只开一个竖井，以致不仅没有足够的空气流动，而且一旦这个竖井堵塞，连一个出口都没有。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103页

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103页

工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很大一部分关于产业大军伤亡人数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厂拥挤，通风很差，等等。

早在1855年10月，莱昂纳德·霍纳就抱怨说，尽管横轴的危险已经不断为事故，而且往往是为死亡事故所证明，而安全设备既不用花许多钱，又丝毫不妨碍生产，但许多工厂主仍反对关于横轴应有安全设备的法律规定。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第6页）

在同一报告中，霍纳还谈到，许多工厂在开动机器时没有预先向工人发出信号，因为在未开动的机器上总是有些事要做，所以总是有手和手指同机器接触，这样，由于没有信号，就不断发生事故。（同上，第 44 页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 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 3 卷 104 页

西蒙医生提出了一条规律，并且用大量统计材料加以证明：

“一个地方靠室内劳动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个地区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原因是通风条件差。

“不管什么地区，只要那里一个重要的行业是在室内经营的，那里工人死亡率的增加，就足以使整个地区的死亡统计带有一种特色，即死于肺病的占绝对多数。这条规律也许在整个英国都没有例外”（《公共卫生。1863 年第 6 号报告》第 23 页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 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 3 卷 107 页

这个报告在说到女时装工的过度劳动时说：

“高级时装店青年女工的过度劳动，她们在工场照例每天要干整整 14 小时，在有大批紧急订货的时候，每天要干 17—18 小时，有几家有时用额外时间付给特殊报酬的办法，来大大延长正常的劳动时间；另外几家在正常的劳动时间结束后，让工人把活

带回家里去完成。这两种过度劳动，统统都是强制性的”（《公共卫生。1863年第6号报告》第28页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111页

英国卫生局的这个主管人员得出的结论是：

“现在千千万万个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公共卫生。1863年第6号报告》第31页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111页

五、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

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278—279页

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这种不断增长的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又引起利润率重新下降。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279页

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闲置下来，由此使就业的部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283页

资本的生产过剩，从来仅仅是指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

能即能够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285页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但是，这种资本对就业的工人人口和该国本身来说，都是绝对的过剩资本。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285页

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

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287—288页

如果利润率下降，那么一方面，资本就紧张起来，个别资本家就用更好的方法等等把它的单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压低到它的社会平均价值以下，因而，在市场价格已定时赚得额外利润；另一方面，就出现了欺诈，而普遍助长这种欺诈的是狂热地寻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以便保证取得某种不以一般平均水平为转移并且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的额外利润。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288页

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288—289页

六、货币资本、产业资本、企业经理与董事

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运动的的全部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390页

货币资本家在把借贷资本的支配权出让给产业资本家的时间内，就把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让渡给产业资本家。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393页

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表现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0，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01页

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稳步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04页

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同时，由于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对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04—405页

在货币市场上，只有贷出者和借入者相互对立。商品具有同一形式——货币。在这里，资本是存在于独立的价值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上。[……]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13页

利息不外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执

行职能的资本家，即产业家或商人，在他不是使用自有的资本而是使用借入的资本时，必须支付给这个资本的所有者和贷出者的。

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产生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产生出利息率。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15页

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与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

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不是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而是从资本的职能中得出他对企业主收入的要求权，一旦他用借入的资本来经营，因而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归两种不同的人所得，这种情形就会表现为直接存在的对立。企业主收入来自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也就是说，是来自于职能资本家执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这些职能时所从事的那种活动或行动。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26—427页

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代表，就不象生息资本的代表那样领干薪。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资本家指挥生产

过程和流通过程。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也要花费气力，不管是他自己花费气力，还是让别人替他花费气力。因此，在他看来，与利息相反，他的企业主收入是某种同资本的所有权无关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作为非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

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不是别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工资**，是监督工资，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1. 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动，2. 因为资本家支付给自己工资。利息归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执行资本家的任何职能，而只是资本的所有者；相反，企业主收入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由于这种对立，人们完全忘记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由于利润即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两个部分的对立形式，人们忘记了，二者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的分割丝毫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的存在条件。

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作为别人所有的资本的代表，同雇佣工人相对立；货币资本家则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来代表，参与对劳动的剥削。由于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职能同在再生产过程外的资本的单纯所有权的对立，人们忘记了：能动资本家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

同工人相对立，才能执行职能，才能使工人为他的利益而劳动，或者说，使生产资料发挥资本的作用。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26—427页

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这个利润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同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总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后作为所谓企业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相独立并且完全分离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31页

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他人劳动的量，而且就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说，上述工资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取决于他为进行这种剥削所付出的，并且在适当的报酬下，可以让一个经理去承担的那种努力的程度。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35页

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

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这种监督工资会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随着导致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下降的普遍发展，这种工资也像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越来越降低。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36—438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行使的监督成反比。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38—439页

七、银行、信用与股份公司

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

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53页

用未售的商品作担保得到贷款越是容易，这样的贷款就越是增加，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于是就产生了为换取贷款而对印度和中国实行大量委托销售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58—459页

Ⅲ. 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1. 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

2. 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

3. 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在股份公司内部，职能

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94—495页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股份公司〕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97页

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

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497—498页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革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

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00页

八、银行资本、有价证券、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家与经济危机

银行资本由两部分组成：1. 现金，即金或银行券；2. 有价证券，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还可以包括地产抵押单。由这些物质组成部分构成的资本，又分为银行家自己的投资和别人的存款，后者形成银行营业资本或借入资本。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26页

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

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32页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用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33页

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事实上是现实资本的证明。但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去支配这个资本。这个资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证书也就成为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能得到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偿付。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40页

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

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所以这个想象的财富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41页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这种想象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部分。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41页

国债券也像股票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42页

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一旦由于回流延迟，

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

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的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46—547页

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要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的时候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47页

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

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佣。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48页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之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55页

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属性,在危机中一般地说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就它们本身作为货币资本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流通而言,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降价。

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的行情下降，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58—559页

借贷资本靠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在工业周期的各个不利阶段，利息率能够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暂时把这一些处境特别不好的营业部门的利润全部吞掉。同时，国债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价格则会下降。这正是货币资本家大量购进这种贬值的证券的时机，而这种证券的价格，在以后的阶段，很快又恢复并超过它的正常水平。那时，它又被卖掉，因此公众的一部分货币资本就被他们占有了。没有卖出的部分则带来较高的利息，因为它是在降价时买进的。但是货币资本家赚到的，由他们再转化为资本的全部利润，首先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凡是在信用事业随着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扩大而扩大时，这种积累也都必然跟着增加。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69页

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把货币贷给银行家，这个

银行家又把货币贷给另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因此,银行家就表现为恩赐者了;同时,对这种资本的支配权,就完全落到作为中介人的银行家手里了。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72页

货币资本的积累是由一群发了财并退出再生产领域的人引起的。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73页

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货币贷放者、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77—578页

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像伦敦那样的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类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进行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79页

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了最高限度，与此同时，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相反地，在危机以后的复苏时期，人们要求借贷资本，却是为了购买。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580页

伦敦有很多大的货币资本家，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一定的時候使整个货币市场陷于混乱，并从中极其无耻地榨取那些较小的货币经营者。这就是说，有这样一些大鲨鱼，他们能够抛售一、二百万镑统一公债，从市场取走等额的银行券（同时也就是取走等额可供支配的借贷资本），因而使紧迫情况大大尖锐起来。只要三家大银行联合行动，就能够用同一手法把紧迫情况变为恐慌。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613页

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的货币贷放者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懂

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618页

九、综 述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

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产品中。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926—927页

剩余劳动一般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应当始终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像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做积累），一定量的剩余劳动是必要的。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约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927—928页

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

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994页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995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偶然波动中，实现着生产的社会平衡。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996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而发展的，并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于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他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在这种权威的承担者中间，在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

规律。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997—998页

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是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随着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的消失而消失。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999—1000页

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

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1001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积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1001页

第三节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述摘抄

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589页

在现代社会关系中，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泉源，是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人为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并维持他的家庭——这保证在他死后劳动力继续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这些生活资料

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代表了劳动力的价值。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591页

资本家按周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并由此购买到工人一周劳动的使用权。[……]假设一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代表3个工作日，那么，这个工人从星期一开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全部价值偿还了。[……]资本家已经购买了工人一周的劳动，所以，工人在剩下的3天中也必须继续工作。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泉源，是资本继续不断增大的泉源。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591—592页

一切不劳动的社会成员，都是依靠这种无酬劳动维持生活的。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酬劳动支付的。全部现存的社会状况都是建立在这种无酬劳动之上的。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592页

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奴隶必须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所还给他们的劳动，

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徭役劳动废除为止，情形也是这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时间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者是分开的。现在，形式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593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资本家为一方，雇佣工人为另一方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重新生产出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的贫困。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而已，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大，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像它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它本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出无产的工人阶级。可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军，在营业状况不佳或平常的时候，是在他们劳动的价值以下，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经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

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产业后备军都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595—596页

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596—597页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89页

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

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92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492—493页

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

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500—501页

正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平庸的颂扬者宣扬工资决定价值的观点，同时还把资本家的利润说成一种高级的工资、禁欲的报酬（因为资本家没有荡尽他的资本）、冒险的奖赏、经营管理的报酬等等。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537页

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

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22—624页

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止境地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命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力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24—626页

事实上自从 1825 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商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步伐逐渐加快[……]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 年）

摘自《选集》二版 3 卷 626 页

在危机中，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 年）

摘自《选集》二版 3 卷 627 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

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27—628页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

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29页

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起来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29页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真切表达。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4页

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5页

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的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充

分的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英国现在已经渡过了我们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并从法律上确定工作日特别是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摘自《选集》二版4卷422—423页

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 and 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摘自《选集》二版4卷428页

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也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未曾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同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而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摘自《选集》二版4卷430—431页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摘自《选集》二版4卷432页

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

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摘自《选集》二版4卷433—434页

第三章

人类解放事业

第一节 人类解放事业的目标

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1843年）

摘自《全集》二版3卷474页

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地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摘自《全集》二版3卷311页

[请工友们注意：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上的一个“环节”、一种“形式”，但“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那末，目标是什么呢？请继续往下看。]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

而代之以联合。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着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37—238页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43页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

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87—288页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92—293页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

生产力的总量。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93—294页

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9—1850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409页

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

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绝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摘自《全集》二版 31卷 103—104页

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

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928—929页

只要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从而消灭现有的压迫条件，并由此迫使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生存而工作，这样，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基础就会消除。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126页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这一目标。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609页

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1872年）

摘自《全集》一版18卷67页

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313页

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资料。由于现实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已经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以及工业不振状态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

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确立这样一种状态，这时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336页

[工友们请注意：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由“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目标的实质。达到这样的目标，既是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也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也就是人类解放事业，反之，亦然。]

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

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精神上的指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起落到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将把这种社会的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即全部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从特权阶级的支配中夺过来，把它们转交给全社会，作为共有财产。这样就第一次真正把它们变成了社会的基金。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538页

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544—545页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46页

生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是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有可能的自由联合为基础，这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11页

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174页

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归根到底，一定

会完全符合那个经过 60 年的分歧和争论才成为战斗的欧洲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公认的纲领。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让他们供全体和为了全体的利益而共同使用。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1887 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390 页

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避免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显得愈加荒谬和愈加不需要了。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下，现代的阶级差别将消逝；而且在这个制度下，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

——恩格斯：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 年单行本导言》

摘自《全集》一版 22 卷 243 页

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 [……] 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恩格斯致朱·卡内帕》(1894年)

摘自《全集》二版 47 卷 730—731 页

第二节 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前提、条件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摘自《选集》二版 1 卷 86 页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
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
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
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
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
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
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
政权的新的阶级统治呢？不是。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
要消灭一切阶级。

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
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
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
现。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
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
再是**政治革命**。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194—195页

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
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

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制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集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10—211页

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要看生产的发展阶段。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越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38页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83页

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着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91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1年—1852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585页

设想在交换价值、在货币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

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那是再错误再荒谬不过的了。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

摘自《全集》二版 30 卷 108 页

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而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堂·吉河德的荒唐行为。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

摘自《全集》二版 30 卷 108—109 页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的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

摘自《全集》二版 30 卷 286 页

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的——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

摘自《全集》二版 31 卷 96—97 页

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1866 年）

摘自《全集》一版 16 卷 215—216 页

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 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9页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9—10页

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占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的基础。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683页

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

富和生产力求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596—597页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591—592页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合作。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609页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

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272—273页

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525—526页

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32页

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的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928—929页

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

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1892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717—718页

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而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大约 5000 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 1800—1840 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

其次，较低级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

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的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441—443页

第三节 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主体与理论

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118页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193页

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 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从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盈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

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79—281页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82页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82页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85页

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10—211页

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30页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

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

摘自《全集》二版 30 卷 112 页

[工友们请想想：为了能够“共同的控制”社会，每个人都要发展自己的能力，不仅会劳动同时还要会思考，不仅是一个劳动者同时又是一个思想者；如果不去思考，那不就得永远听凭别人支配、控制吗？]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自由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另一主体又加入到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只要劳动像在农业中那样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

摘自《全集》二版 31 卷 108 页

[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广大劳动者不仅可以去掌握社会科学、参加社会管理；而且去掌握自然科学、使生产与科研结合在一起]

认识到了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为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

摘自《全集》二版 30 卷 455 页

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资本论》1 卷，摘自二版 18 页

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 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589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这一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合作。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609页

工人阶级在日益增长着的财富中仍然是无产者，在日益豪华奢侈的世界中仍然是穷光蛋。物质的贫困不论在精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残着工人。工人不可能指望别人的援助。因此，在他们面前就产生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绝对必要性。工人应该改变他们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现存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应该改造社会。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17卷684页

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的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能实现胜利的革命。[……]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在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之下。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

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是不够。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243—244页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33—634页

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1879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85页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达。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4页

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258页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它

就越会深入他们心坎。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7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681页

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1888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57页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但是不久它就被那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由二月革命开始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1890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62—264页

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1890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64页

《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序言》（1892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66页

工人阶级在前行，如同英国的种种事情一样，迈出的是缓慢而适度的步伐，有时踌躇不安，有时做些没有多大效果的尝试，在前行中有时过分小心地猜疑“社会主义”这个词，却又逐渐吸收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现在它已经唤醒了伦敦东头的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么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以后照例是永不会丢失的，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么，孙子们则渴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

保证胜利。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1892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717—718页

比社会主义的英国一般获得的进步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重新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一潭死水了。伦敦东头甩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没有技术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直觉的社会主义者，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摘自《选集》二版4卷431—432页

“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工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

增强了。这股力量早在 1824 年就已显露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进的一翼；当 1832 年的法案剥夺工人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并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以对抗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2 年英文版导言》

摘自《选集》二版 3 卷 704—712 页

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集团。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1894 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494 页

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应该拥护什么。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

——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1895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521页

第四节 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道路与方法

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摘自《全集》二版3卷347页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需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39页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83页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

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306—307页

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面前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588—589页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行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

区别开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611—612页

资本家想尽量延长工作日。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而工人则正确地感觉到，超过偿还工资的每一小时劳动，都是不合理地从他身上榨取的；他亲身体会到工作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几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为规定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英国的工厂区[……]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也就变为10小时了。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594页

普选权会迫使统治阶级对工人表示好意。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四五个代表便是一种力量。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595页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样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33卷 210页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这一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

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合作。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年）

摘自《选集》二版2卷609页

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殊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们只合乎工人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但是怎么能够号召所有的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的协会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就会失掉被称做国际的权利。

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17卷683页

无产者在全社会面前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只有在这一使命激励下的无产者才能夠把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94页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 卷 362—363 页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

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时刻已经到来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17卷594页

不应当认为，在议会里有工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如果他们像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样得到在议会讲坛上讲话的机会，那末全世界就会倾听他们的意见。

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它们以反击。每一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但是必须选出真正的人。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

（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17卷697页

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

（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17卷700页

在政治情况恶劣到连集会权利都成为非法的法国和意大利，参加秘密团体（这种团体的结果总是不好的）的倾向会十分强烈；并且这种组织形式妨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为这些团体不是对工人进行教育，而是要工人服从束缚工人的独立自主和模糊他们意识的那些强制性的和神秘的法规。

——马克思：

《1871年9月22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摘自《全集》一版17卷703页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1872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48页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去简单地运用暴力占有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还是为此立即给以补偿，或者是通过缓慢的分期付款办法赎买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试图预先面面俱到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留给别人去做。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

摘自《选集》一版3卷217页

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完全不中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所达到的高度使社会不再能够消耗掉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因为生产者大众被人为地和强制地拒之于这些资料之外；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仅毁灭了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来重新平衡；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之免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的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372—373页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

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248—249页

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通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513—514页

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一版3卷241页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

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30页

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33页

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

担变成一种快乐。[……] 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44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673页

这里所谈的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包含在其中的社会变革（转变）。只有当该社会中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不用暴力的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而且这也只能在社会发展所要求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和平的”运动一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而如果这些人被暴力所镇压，那就因为他们是“合法”的暴力的反抗者。

——马克思：《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1878年）

摘自《全集》一版45卷194—195页

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监督和观念上的总括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业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2卷152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马克思：《资本论》二版（1873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3卷965页

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

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1881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765页

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

要剥夺农民[……]请你们试一试，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你们即使动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再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

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展农业生产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窃取它的果实。

破坏性影响的这种促进作用，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1881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767—768页

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够在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有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年）

摘自《选集》二版3卷775页

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1882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51页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

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1883年）

摘自《选集》二版1卷252页

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桌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摘自《选集》4卷173—174页

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

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

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5页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恩格斯致奥·伯尼克》（1890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693页

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705页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步入新社会，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就是揭去专

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摘自《全集》一版22卷273页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摘自《全集》一版22卷274页

英国现在已经渡过了我们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并从法律上确定工作日特别是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的斗争。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摘自《选集》二版4卷422—423页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

件之一。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摘自《选集》二版4卷432页

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摘自《选集》4卷433—434页

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政权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我们使之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越迅速和越容易。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498—500页

使本书[《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一个统治的少数这样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他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于是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

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或表面的利益的。在个别场合，这些比较激进的要求也曾实现过；不过，往往都只是瞬间的，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了上风，刚取得的成果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呼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大多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

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一旦达到这一点，从而得到眼前需要的东西，激进派及其成就又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 17 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 1848 年，就连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白应该选那一条道路。

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那么，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正好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了他们自己还没有理解到，而只是刚刚模糊感受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现在问题不是要欺蒙，而是要实现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当时还根本没有为这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

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 1848 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 1848 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

——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1895 年)

摘自《选集》二版 4 卷 508—512 页

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

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1895年)

摘自《选集》二版4卷517页

第五节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它必将遍立于全世界”

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1870年)

摘自《全集》一版17卷7-8页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到：“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17卷355页

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17卷358页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

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卷 358页

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卷 359页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卷 359页

应该[……]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

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 卷 359—360 页

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 卷 360 页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 卷 361 页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 卷 361 页

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 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 卷 362 页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 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 卷 362—363 页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们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卷 366—368页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卷 383页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卷 384页

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行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权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它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

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篡夺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 卷 586—587 页

只有因对全社会负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无产阶级，即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 卷 587—588 页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

队。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 卷 588—589 页

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以议会的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 卷 589 页

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置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

的特殊阶层所私有。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17卷589—590页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篡夺、欺骗、权诈才能由少数人把它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公社以下述措施来开始解放劳动——它的伟大目标：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另一方面，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由此可见，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不但以政治改造，而且以经济改造来开始其工作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17卷593页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

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17卷594页

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它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卷 642页

政府的镇压力量和控制社会的权威会这样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勤务员来执行。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1871年）

摘自《全集》一版 17卷 647页

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摘自《全集》一版 17卷 677页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

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地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

政。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

摘自《选集》二版3卷9-14页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